

## “文津讲坛”中国语言文字系列讲座综述

□ 张伟丽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特征，文字作为人类文化的精神载体，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与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克里特文字一样，共同承载了人类古老的历史文明。相较而言，汉字作为世界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毫不间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无疑是最为独特、最为神奇的文字。鉴于此，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策划了“中国语言文字系列讲座”，目前已经开展了二十余场，内容主要分为五大类：汉字的诞生与发展变化，字音字义的变化及国际影响，古文字典籍专书解读，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规则及数字化工作。这五大类几乎涵盖了目前汉语言文字研究的大部分内容，邀请专家从语音、语义到民俗典籍文字、语言地理学再到汉字字形及信息化处理等多个领域解读，内容深入浅出，紧扣学术前沿，紧密结合当前形势，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业内人士都获益匪浅。下面具体来看这五大部分。

### 一、汉字的诞生、造字法、发展趋势及文化含义

要想全面认识汉字，首先要对汉字的诞生、发展阶段有全面的认识，对汉字的演化机制及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相关讲座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立军教授所讲的《汉字的取象法则与文化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贵元教授所讲的《汉字发展的阶段及其演化机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齐元涛教授所讲的《汉字发展的目标》。

《汉字的取象法则与文化价值》主要讲述了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的地位、汉字构形的取象法则、汉字构形的演化趋势、汉字构形的文化价值等几方面内容。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远扬于四面八方，不仅对记录我国民族语言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远播周边国家，对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字和文化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覆盖东亚、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在不同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均曾以汉字作为正式文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明印记。汉字能够有如此大规模的传播和发展与构形方法密不可分，汉字构形的演化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造类型由单纯表意走向音义合成，二是主要矛盾由建构系统走向书写便捷。

汉字源自生活，反映生活，是古人生活的真实记录。汉字构形涉及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其文化价值有必然性、丰富性和有限性。汉字构形不仅反映了古代的物质文化，也部分地体现了精神文化。不过，汉字构形与古代文化的关系虽然非常密切，但汉字构形并不具备确证古代文化的功能，只能作为一种旁证，毕竟汉字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与其所产生的社会时代有了难以弥合的隔阂。因此，在研究汉字构形的文化价值时，不要盲目夸大，更不能罔顾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据后代字形望文生训。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为什么能够一直沿用至今，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王贵元教授所讲的《汉字发展的阶段及其演化机制》涉及了汉字产生到现在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汉字是怎么逐渐演变过来的，汉字的演变蕴含了什么样的传统文化的智慧等几个方面。汉字从诞生至今经历了古文字阶段和今文字阶段。古文字阶段以甲骨文为代表，主要有两个特点：

1.只记录关键词；2.词序、字序具有图画性，都是物象的反映。古文字形态中，字形不表示词的音和义，而是隔过了词，直接表示事物，即古汉字绕过了汉语的基本单位——词，直接表示客观事物。古文字阶段汉字的形体特征是象形和亚象形。象形特征存在于汉字产生至西周中期，亚象形特征存在于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汉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今文字阶段，形体特征包括古隶、今隶、楷体、简楷。古隶存在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今隶存在于西汉晚期至魏晋时期，楷体存在于南北朝至二十世纪初，简楷则存在于1956年至今。其中楷体作为目前存世时间最长的汉字形态，其诞生标志主要是笔画的变化，南北朝时期提画和钩画正式形成，点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就造字法来说，汉字最早期的形态是独体字，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字与字的组合，进入到合体字造字阶段。“字”的意思指的就是合体字，是汉字发展的重要时期，为现代汉字的最终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保存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

汉字从造字、逐渐成型到不断变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随着不同时代的发展，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汉字一直在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什么，汉字的未来又将如何？《汉字发展的目标》回答了这个问题，该讲座主要讲述了汉字变化的特点、汉字发展的动因、汉字书写发展的目标及构造的发展目标。早在甲骨文时期，汉字就能够以线条摹物，发展到小篆后，汉字变得更加工整，线条更加规范和美观。为了书写更加方便，更加快速，汉字从小篆发展到隶书，进入到今文字阶段。很快，隶书吸收了草书的灵动和活泼，发展出了后世熟知的楷书并先后出现了点、横、提等笔形。最终，汉字经过笔画化，规整、减量到趋直、反逆，顺应了汉字在书写上向着便捷化的发展目标。

从汉字发展的过程来看，汉字造字的主要特征是：1.用含有固定含义的基础构件构成不同的汉字。2.构造模式的形声化。形声字产生后，有了意符和音符，于是出现了规整的汉字，而且不同构件的组合，可以互相关联，有较强的规律性。汉字明确了意符和音符后，汉字的结构随之受到影响，当构件固定下来并可以改变位置时，汉字便向着更便捷的角度发展开去。后世汉字不断地组合，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能够在获取更多的汉字语义信息的同时，使得字和字之间有足够的辨识度。随着现代人阅读和书写习惯的改变，汉字书写趋向简化，构造也随之变化，这些都是影响未来汉字变化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汉字在书写上的发展是简繁适度，而不是一味求简。

关于汉字的诞生及其发展，2005年任继愈先生在“文津讲坛”所做《汉字的再认识》讲座，2009年苏培成教授所做的《汉字进入了简化时代》讲座也是关于汉字发展过程、目标和特点的。

## 二、解读汉字的语音、国际影响及相关文化阐释

汉字的字形和字音联系宽泛，有超拼音规则的性质，有利于不同汉语方言的人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共享古今中外的汉字文本，从而形成强大的汉字文字圈。相关讲座有北京大学中文系陈保亚教授所讲的《超越拼音规则：汉字文化圈形成的文字机制》，北京大学中文系孔江平教授所讲的《中华传统有声文化的科学视角》。

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三种文字，苏美尔文字、埃及圣书字、汉字，目前只有汉字至今保留了表意系统，没有发展成拼音文字，因此汉字属于超音规文字。超音规加上汉语文本强大的共享能力，使汉字文本得以迅速扩展，极大提升了汉文文势和汉语语势，有利于形成深上层

的汉字文化圈。《超越拼音规则：汉字文化圈形成的文字机制》讲述了超音规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内容包括：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字、汉字的生命力、超越拼音规则的文字、汉字强大的历史书写功能、汉字强大的多语共享功能、汉字共享与文势积淀、汉字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比较、对世界通用文字的思考等内容。

汉字凭借字形和字音联系宽泛的优势，借助超拼音规则的帮助，具备了强大的文本共享能力，使汉字文本得以迅速扩展，汉文化得以迅速积淀。汉字使汉字文化圈有了书写纽带，汉字作为汉字文化圈书写的母语，不需要任何中介语介入，汉字文本可直接共享。汉语言文化圈人口多，文势强，融合民族语言多，使用汉字的人口不断增加，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固定的汉字文化圈形成之后，汉语国际化的价值随之凸显了出来，不仅在文化上利于汉文化的传播和传承，经济上和学术上也会创造出较大的价值，汉字文化圈将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汉字也是汉语国际化和跨语言文本共享的主要书写纽带之一，并借此维系和传播华夏文明。有学者称：“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汉语与中国文化重新受到周边国家的重视，东亚、东南亚等传统汉字文化圈国家再度兴起“汉语热”。尽管去汉字化论调仍时隐时现，但文化层面的“再中国化”成为传统“汉字文化圈”国家逐渐明晰的文化战略”<sup>①</sup>。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其中有一类是以声音为载体的文化，我们称之为“有声文化”。而中华传统有声文化更是有其特定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概括起来可称为四律：“声律”“格律”“曲律”和“乐律”。声律介绍中国语言的基础，格律主要介绍汉语不同方言的古诗词吟诵，曲律主要介绍昆曲发音、苗族古歌等，乐律主要以中国传统礼乐的八音为基础，介绍编钟、古磬、古琴等古代乐器。

《中华传统有声文化的科学视角》主要讲述了以下几部分内容：1.人类语言和有声文化的起源。2.有声文化的基本性质。3.中华传统有声文化中汉语古诗词吟诵、昆曲、蒙古族呼麦、藏传佛教诵经、舍灯大鼓、腹语、拉玛白族的抖喉、哈尼多声部民歌、侗族大歌、彝族口弦琴。4.中国传统乐器。5.有声文化的基础理论框架。6.语言与音乐的相互依存关系。

由于语言认知科学和音乐认知的研究逐渐证明，语音和语言是音乐的认知基础，有声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人类起源和演化中，大脑认知能力的演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自然选择了语音作为思维和语言沟通的介质，从而催生了文化的形成。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基于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不同的有声语言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差异。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进一步加强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有声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提升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来看，汉字的超音规特性有利于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对于多民族的有声文化研究更是紧跟时代潮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汉字语音的讲座还有2010年“文津讲坛”举办的《非文字史料与多重声音看历史》讲座，也是从语音等非文字史料的角度来研究分析历史现象。

### 三、古文字典籍专书解读

<sup>①</sup> 刘志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价值》，《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88页。

古文字典籍专书解读主要指的是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的研究诠释。相关讲座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守奎教授所讲《古文字视野下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是古文字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需要充分加以利用。今天的人们，在古文字学的视野下来看《说文》，会发现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古文字视野下的〈说文解字〉》就如何从古文字的角度研究《说文》，怎样充分利用《说文》去学习、研究古文字做出了充分的阐释，毕竟离开《说文》的古文字研究没有根基，离开古文字的《说文》研究没有出路。

一直以来，古文字学习有两条路径，一是传统的学习方法，以《说文》为基础，二是直接从古文字文本和常用字入手。两条路径最好结合起来，做到研究《说文》与古文字同时学习，二者可以同步进行。利用《说文》研究古文字，利用古文字研究《说文》是一个必然趋势。掌握了《说文》中的常用字，古文字中的大部分文字就都可以识别，《说文》中那些来源不明的字中也蕴含着解读古文字的线索。在古文字视野下研究《说文》，还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如“土”的三个来源：土、圭、牡。以斧钺形“土”，传承有序；“圭”是甲骨文中“吉”字的从字，不过这种用法随着商代的灭亡而消失了；“牡”形与“土”与“土”相近，或讹变为“土”，或讹变为“土”。最终土、圭、牡、土因形体相近，彼此混讹，致使《说文》对土、圭、牡等字的分析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也给后人留下了古文字发展中的宝贵线索，也是重要的贡献，并不能因为这些错误就否认《说文》的重要地位。所以说，熟悉《说文解字》，对古文字就学得更快，理解得透彻，而学习完古文字之后，再来看《说文》，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也会取舍，二者相辅相成。比如说楚文字与小篆的关系：“楚文字与小篆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说文》古文与小篆的关系，也可以代表楚文字与秦文字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有助于理解楚、秦两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对以《说文》体例编著古文字形体类工具书有着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sup>①</sup>。

如果研究者把眼光放开，就会发现《说文解字》的研究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站在今天的文字学即新的文字学视野下，重新去学习《说文》，我们不仅可以从《说文》走出来，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文津讲坛”十分重视《说文解字》相关内容的讲座，先后于2007和2017年举办《〈说文解字〉与古代文化》与《〈说文〉的魅力——与出土文献互动的〈说文〉研究》两场讲座。这些讲座丰富了《说文解字》的解读内容，采用了二重证据法进一步阐释《说文解字》，对于相关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四、语言使用规则及现实意义

在了解了语言的发生、发展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规则和方法、语体嬗变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相关讲座有清华大学中文系张美兰教授所做《变异与规约：清末北京官话口语与明清小说的语体嬗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王敏研究员所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概说》。这两个讲座，一个讲述早期汉语口语传播与发展，一个讲述现代通用语言的传播与规则，互为借鉴，相得益彰，从中颇能看出汉语口语变化的历史轨迹。

<sup>①</sup> 李守奎：《略论楚文字与小篆的关系》，《北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6页。

《变异与规约：清末北京官话口语与明清小说的语体嬗变》主要讲述我国清代末年的北京官话教科书，作者在编撰这些教科书时利用文学题材进入汉语教科书，客观上起到了加大汉语传播的作用。这种现象是文学界很少关注的，也是汉语教育史领域里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白话口语发展进程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

该讲座围绕早期汉语教科书对中国传统文学题材的变异与规约，来探讨早期汉语口语的传播与发展。变异是指教科书的编撰者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中，如戏曲小说作品中寻找可以用来做北京官话教材的材料，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中文学习融为一体，是早期域外北京官话教材的一种积极的尝试。规约是编者为了便于读者接受，在改写相关材料的过程中，通过一些特定的条件来制约篇章的结构、语言表现形式、原文内容改编等。变化的宗旨就是强调汉语教科书教育的特点，用这个宗旨来规约整个汉语口语教材的编写。这不仅是域外汉语教材中的一个新特点，也是对汉语口语的白话文建设方面的一个真正的实践，属于早期白话文发展的另一种形态。

在晚清新白话文实践上，编撰汉语官话教材最具超前性，极大地推动了来自民间团体的白话文运动。这种来自民间的域外教材，将汉语白话实践扩展到了域外汉语学习实践中，涉及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不仅提高了语言水平，还促进了文化学习。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过去还是现在，以小说、戏曲作为语言学习教科书的并不少见，有人物有情节的小说或者是戏曲作品，始终是最吸引人的。对我们现代语文教学来说，更应该注重在选材的时候，把历史、文化、文学的一些信息渗透进来，让华语区不同地域的年轻一代，通过这些语文教材能够相互了解，相互沟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概说》主要讲述自 2001 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诞生后，将通用语言文字定义为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从国家层面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等内容。通用语言文字的效力受法律保护，适用于国家机关、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出版物及公共服务领域。通用语言文字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应用性和作为不同地域、人群的沟通工具。通常一种成熟的语言有两种途径实现规范化：历史层累的形成和政府的主动规范。通用语言标准化的工作主要由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规范标准、社会共识几个层级构成。

该讲座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概念。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情况。3.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工作机制对于相关研究的影响。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其语音形式规范主要包括《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词汇规范包括《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拼音词汇》，综合性的规范包括《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等。通用汉字整理的内容则包含定量、定型、定音、定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掌握语言学的一些理论知识，对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通用语言的研究角度不仅包括语言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扩展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也涉及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对社会语言的应用、社会语言的生活的影响，同时要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领域的各个学科，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这样才能做到语言标准化工作不断适应时代的需求。

关于语言规范的讲座还有 2006 年江蓝生所讲《关于当前语言文字规范的几个问题》，2007 年王蒙先生所讲《语言的功能与障碍》，2008 年蒋绍愚所讲《汉语史研究的意义》都

涉及到了语言学的研究意义和实际使用情况。

## 五、语言文字类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除了研究文字的诞生、变化和口语传播、交流,探讨文字类古籍的数字化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相关讲座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周晓文教授所讲《古代字书的数字化整理》。中国古代字书简单来说是指字典,字书源远流长,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的识字课本。历代字书,尤其是古代字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价值,到现在仍然是我们离不开的工具和研究的对象。该讲座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关于字书、字书的发展与类型。2.字书数字化整理的现实意义。3.字书的数字化加工与处理。

根据各类字书的核心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说文”类、“六书”类、楷书字典类、训诂类、方言类、音义类、韵书类、字样类、古文类等。代表作品如《说文解字》《尔雅》《玉篇》《方言》《广韵》等,涉及范围包括方言、经典释文、韵文、字样标准等。《说文解字》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对汉字进行研究的第一本书,是体现汉字具有系统性、有构字理据和思想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对汉字研究、古文字释读、甚至汉字教学都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所做字书数字化工作中涉及最多,成果丰富的一部书。古代字书数字化涉及多个领域,既涉及到信息处理,也涉及到语言文字学研究,属于交叉学科。对于文献典藏、古籍整理、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特别是编码方面,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字书数字化的发展会促进传统的文字学研究,更加开拓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领域和空间。反之,文字学的研究也会促进或者是为数字化的发展、为信息技术提供支撑,包括资源采集、图像加工、文字采集、字料库等。字料库在做字书的数字化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文字学研究需要保存每一个字形。每一个字形的保存本身,除了整理的需要,也是典藏的需要。某个字形在历史当中出现过,就像保存文物一样,这个字形也属于文物,也需要保存下来,也要储存下来。如果不把单个字截取出来,作为字形库存储的话,很容易丢失,也可能消失。消失的结果有可能对一些字的解读和它演变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变体的情况就会中断。所以每个字都要有它的原图的储存,也就是字料库存在的意义。

如果把字书的数字化看成关于文字学与文献数字化的交叉学科的话,“文津讲坛”在早年举办语言文字类讲座时就十分重视学科交叉,2004年曾邀请吴小如先生做了《治文学宜略通小学》的讲座,属于文学与小学的交叉研究。2004年宋镇豪先生所讲《甲骨文中所见的学校教育》,2018年黄锡全先生所讲《古文字与古货币》都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范围。

此外,“文津讲坛”也一直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2007年举办了《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生活》讲座,2011年举办了《图画怎么变成了文字——中国西南濒危文字文化解读》讲座。2009年举办的《契丹文字解读概况》讲座,更是对已经消失的契丹族文字的研究状况做了详细的介绍。

汉字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不仅是古代文明的延续,同时也记录着今日中国,如何通过文字与语言更好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文明与历史是每个国人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有重要的意义。